

荒尾精与汉口乐善堂

——晚清日本在长江流域的情报活动与经济渗透

李博强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甘处岛国之境”,推行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海外扩张政策。青年时期的荒尾精承袭“征韩侵华”思想,提出“兴亚主义”与“宇内统一论”,竭力为日本政府的海外扩张政策张目。潜入中国后,荒尾精在湖北汉口设立乐善堂,大量招募日本“志士”与浪人从事情报搜集与经济渗透活动。汉口乐善堂的建立与发展得到了日本军政商界的支持,使之成为盘踞华中地区的日本间谍核心机构。荒尾精的思想与言行是明治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侧面,其“兴亚主义”和“宇内统一论”思想在当时日本具有一定影响力,但质而言之,不能改变其侵略思想的本质。

关键词:荒尾精;汉口乐善堂;情报搜集;经济渗透

中图分类号:K252;K31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4)01-0112-05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全力推行所谓“大陆政策”,即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海外扩张政策,逐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了实现对外侵略扩张的目标,日本参谋本部不断向中国和朝鲜派出大批特务,组成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报^[1]。在这一过程中,荒尾精成为日本谍报活动的“先驱”。荒尾精在湖北汉口建立乐善堂,网络大批间谍人员,在长江流域等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情报搜集与经济渗透活动。本文拟综合运用相关档案与文献资料,以荒尾精与汉口乐善堂的建立为中心,剖析荒尾精的“兴亚主义”与“宇内统一论”等侵略扩张思想,论述汉口乐善堂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在长江流域的情报活动与经济渗透,以促进晚清时期日本侵略长江流域史的研究。

一、荒尾精及其“兴亚主义”和“宇内统一论”

荒尾精(1859-1896年),又名义行,号东方

斋。幼时家道衰败,后被东京警察署警官菅井诚美收养才得以继续读书^①。菅井诚美虽供职于警界,但在军界亦有许多朋友,这些青年军官常聚于其家,纵论时事,竭力鼓吹“征韩侵华”,认为日本“全皇国为一大城”,“吕宋、台湾、满清、朝鲜皆皇国之屏藩”,要先伐朝鲜,余则次第征服之,然后与西方抗衡,称霸世界。荒尾精耳濡目染,思想大受影响。在东京外国语学校读书时,荒尾精认为在此“很难完成宿愿”,“不如辍学从军,借此学习军事并研究中国问题,以备他日赴华之需”^{[2]7}。在这样的想法下,荒尾精离开了本已入读的东京外国语学校,转入陆军教导团,就读于炮兵科。一年后(1878年)荒尾精从教导团毕业,被分配到大阪镇台担任军曹,随即又被选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3]48}。1882年毕业,授陆军少尉。1885年被调到参谋本部工作^{[4]257-258}。在参谋本部,荒尾精因职务之便,不仅大量接触机密文件,对中国的认识日益深刻,而且得以结交各方人士,建立了日后为其大展身手“保驾护航”的人脉网络^{[3]50}。

在参谋本部工作期间,荒尾精承袭“大陆政策”鼓吹者副岛苍海的衣钵^②,逐渐形成了“兴亚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2112010202)。

作者简介:李博强(1985-),男,内蒙古赤峰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①本文引用的日档案与资料,均由笔者译自原文,所有引文中出现的对中国的称谓诸如“支那”“清国”等,一切悉照原文。

②副岛苍海认为:“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海岛之境,则永远无法摆脱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第78页)。

主义”与“宇内统一论”等对外侵略扩张思想。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发展雄飞”,“而朝鲜却日益贫弱,清国却逐步老朽”^{[5]361}。荒尾精在其炮制的《兴亚策》中接着说,日本对于“朝鲜的贫弱,即令不为朝鲜忧之,亦应深为我国忧之”;对于“清国的老朽,即令不为清国悲之,亦应深为我国悲之”。日本如欲“内修纲纪,外张国威,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我皇祖皇宗之懿德”,当务之急莫过于“救济贫弱,扶持老朽,使三国和衷共济,唇齿相依,挽回东亚之颓势,重振东亚之声威,以惩罚西欧虎狼,杜绝其觊觎,此乃国家百年之计,不能一日有所忽略”^{[5]361}。荒尾精还以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例,来论证其“兴亚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回顾昔日印度覆亡之祸,东方古国旧邦渐次成为豺狼的食饵,今日除我帝国之外,仅有朝鲜、清国尚存,朝鲜贫弱之极仍未绝灭,清国老朽之极仍未倒毙,尚有一线一脉气息通畅,但宗庙社稷至危险之极则难于维持。”^{[5]361-362}荒尾精认为日本明治维新顺应天意,走上富强之路,自应顺应天意,由日本来领导东亚,以中国、朝鲜为其“屏藩”,名为“唇亡齿寒”,实则占有中国、朝鲜,来实现其“东洋文明光辉宇内,亚洲威风扬于四海”之美梦。荒尾精的“兴亚主义”实际上就是以“兴亚”为名的“侵略有理”理论。

继《兴亚策》之后,荒尾精又撰写《宇内统一论》,竭力为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政策张目。荒尾精宣称:“在宇宙内只有我国拥有万世一系的皇室,(日本皇室)为九族百姓之共同宗室。君臣之义犹如父子之亲,法制道德俱来源于一个皇家,全国浑然如一家团圆,乃天成自然之国家。”^[6]“我国四海六合统一是天命所归,皇祖、皇宗之宏猷远谋,已然是我国前途之最大目的”^{[5]368};在“万世一系”的体制下,日本“完成一统六合,奄有四海的宏猷远谋,是为上天赋予我国之天职”^{[5]360}。荒尾精认为,以日本为中心,“救护贫弱之国成为富强之国,改革老朽之国成为强壮之国,这一事实成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5]362};“相依相扶挽回东亚大势,抵抗西欧之侵略,我国之天职;开导清国之富强,我国之宗旨。然后,清国奔向富强之路,……我国与清国形成唇齿鼎足之气势,发扬振兴东方之志向,谋取东方兴隆与和平”^{[5]364}。荒尾精提出,为实现日本皇室宏猷远谋之大成与远播,“应以皇道行天下,这是对付海外列国虎吞狼食唯一之计,……当今竞奔争夺之状况,恰如群犬争夺腐肉,当此时机,君权神授,拥戴真君,率领忠勇尚武之良民,旧邦新造,以继绝世,天成自然之皇道

攘除虎吞狼食之蛮风,驱除贪名逐利之邪念,收复寸土一民,皇国之天职”^{[5]368-369}。荒尾精的“宇内统一论”实际以“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思想为基调,以“天皇制”为核心,论证日本是真正的“皇国”、日本皇室乃“万世一系”。荒尾精企图借助于日本天皇制的权威,统一日本民众的思想,来实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荒尾精的“兴亚主义”和“宇内统一论”思想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久他晋升为中尉,随后即奉日本参谋本部之命潜入中国执行特殊使命——在华中地区筹建间谍机构。荒尾精来到中国后,建立了以汉口乐善堂为核心的谍报网,为日本输送了大量情报。

二、汉口乐善堂的建立与发展

汉口乐善堂的建立得益于岸田吟香在上海的乐善堂。岸田吟香(1833-1905年)乃日本风云人物,陆军特务机关玄洋社的核心间谍之一,自幼学习汉学、中医,能诗善文,号称“神童”^{[3]51}。居留横滨时期,岸田吟香寄住美国传教士詹姆斯·赫本家中,作为其助手编辑整理《和英对译辞典》^{[5]337}。辞书完稿后,为接洽付印事宜,岸田吟香于1866年9月伴随赫本来到上海,这是其首次赴华,形成了对中国的初步印象^{[5]338}。旅居上海九个月间,岸田吟香眼界大开,开始“通晓中国的事情,对中国的事务极其关心”^{[5]338}。1872年2月,《东京日日新闻》创刊,岸田吟香担任报刊主笔。1874年,日本以报复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害为借口,发动侵略中国台湾战争,岸田吟香担任随军记者^{[5]339}。五年后岸田吟香退出东京日日新闻社,在东京银座开办了以乐善堂为名的药铺,主要经营名为精铸水的眼药^{[5]339}。1878年,为了打开精铸水在中国的销路,岸田吟香又一次来到上海,在英租界河南路开设了乐善堂上海分店^{[5]339}。尔后近三十年间,岸田吟香在沪经营眼药水,开设印刷厂,用铜版印刷诸子百家袖珍典籍,获利颇巨,结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沪上名人。药店也成为日本军事间谍和特务的过往客栈。当时,欧美诸国垂涎于从中国获得各种利权,以种种权术来扶植势力,看到这种情形,岸田吟香“深深对东亚的前途忧虑”^{[5]341}。恰在此时(1886年),荒尾精潜入上海执行谍报任务,岸田吟香对荒尾精的行为极为赞赏,全力资助其在汉口开设乐善堂分店作为情报活动据点。

荒尾精将乐善堂分店设在汉口,有着非常明显的军事意图。荒尾精认为,汉口自古就是军事

重镇,亦是挽救东亚的策源地,“近则与湖南、河南、江西相连,远与陕西、甘肃、新疆、云南、贵州相通,古来被称为九省之会、四镇之一”^{[5]343};“只要以此为基地,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陕西任何一省落入手中,以其富足的财富与人口足可号令天下”^{[5]343}。

荒尾精以商人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在汉江岸边租赁一幢双层楼房开办乐善堂,销售书籍、药品和杂货等^{[5]343},开始了其在中国达六年之久的间谍生涯。乐善堂鼎盛时,店员多达十四五人^{[5]344}。为了发展间谍组织,荒尾精先后到上海、天津等地招募所谓“同胞志士”。在汉口乐善堂集中了井深彦三郎、高桥谦、宗方小太郎、山内崑等主要骨干,同时,还包括浦敬一、藤岛武彦、中野二郎、中西正树等十余人^{[5]344}。这些“志同道合者”被荒尾精纳入麾下,实施其“经略中国”计划,汉口乐善堂从此成为盘距华中地区的日本间谍核心机构^{[3]51}。

汉口乐善堂建立后,为加强对该间谍组织的管理和控制,荒尾精亲自制定了指导方针,主要包括:“(1)清国敌视我国,不理解共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应助成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以实现日清提携;(2)为治理东亚做准备而培养必要的人才,在上海设立学校;(3)在长沙、重庆、北京等地设立支部,保持与革命派志士的联络,促进革命运动;(4)为防御俄国之东侵,派浦敬一赴新疆伊犁,促使伊犁总督刘锦堂决起抗俄。”^[7]在指导方针中,荒尾精名曰“日清提携”,实际暗藏侵略中国的野心。

与此同时,荒尾精还制定了《同志须知》《内员须知》以及《外员探查须知》等规章制度。荒尾精强调:“我堂目标远大,任重道远,非轻易所能致,其关系国家兴亡者实非鲜浅,亟应深谋远虑,慎其行踪,重其举止,做到万无一失,以俟其机,然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务期达到目的”。为了掩人耳目,荒尾精要求堂员在与中国人接触时,“要在商言商,力求符合自己身份”。乐善堂“由堂长总领”,荒尾精自命为堂长;“堂员分两部分,一为‘内员’,一为‘外员’”,“堂长监督内外员,研究进退步骤,兼顾大形势下的谋画;‘外员’在执行任务时,要巧妙运动,避开嫌疑,留心该地区大事,为日后活动创造方便条件”^{[5]347-348}。在《外员探查须知》中,荒尾精规定探查人物主要包括君子、豪杰、长者、侠客和富者,同时也包括秘密结社组织或“匪类”等。外员探查的主要项目包括从土地、被服、阵营、运输、粮食、薪炭、兵制及兵工厂到山川土地形状、人口密度、风俗及善恶贫富等,从军事、

政治、经济等角度对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5]353}。

汉口乐善堂筹建及至建立之后的运作,均得到日本政府及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有力支持。根据《日清通商章程》规定,日本人仅在汉口租界内享有通商权益,未经批准不得在租界外擅开洋行等。当时,汉口乐善堂建立在汉口租界外,日本政府为了支持乐善堂在汉口地区自由活动,由日本驻汉口领事町田实一向江汉关道台交涉,提出汉口乐善堂可在租界外自由经商并降低厘金、允许乐善堂自由向中国人销售货物、与瑞士商人亨达利一样享有通商权利、降低内地运入税等要求^{[8]141};同时,日本政府援引欧美商人在汉口租界外开设商店为例,要求以乐善堂为代表的日本商人在汉口租界外可享受内地半税政策^{[8]142}。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在给道台江人镜的电文中提出:“查该地原属租界之外,然已有瑞商亨达利以及播威怡威等各洋行开在该处营生,敝国商民乐善堂亦准如亨达利等洋行均允在该地开铺营生以进两国商民所享。”^{[8]145}面对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江人镜严正指出:“乐善堂拟在马王庙街租屋贸易,自无不可,惟有该处系在租界之外,所有进口货物到汉起岸时,必须报明汉镇厘金局,照章完纳厘金。”^{[8]146}日本政府通过对汉口乐善堂的保护与支持,一方面便利了乐善堂在汉口及长江流域进行情报搜集与商业贸易,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日本对汉口地区的经济渗透,获得更多利权,助长了日本对长江流域经济掠夺的野心。据有关资料显示,为了支持乐善堂的发展,包括日本农商务省、上海三井等十多家政府部门与民间企业,先后以“补偿金”名义予以资助,多者达上千元^{[8]148}。乐善堂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从政府到民间的经济支持,从而成为日本对长江流域进行情报搜集和经济掠夺的“急先锋”。

三、汉口乐善堂在长江流域的情报活动与经济渗透

汉口乐善堂建立后,即开始对中国广大地区进行情报搜集与经济渗透。日本政府利用该据点进行委托贸易,向中国倾销日本商品,其中以纹棉及海产销售最为典型。驻汉口日本领事希望荒尾精利用当地优越的水运、陆运条件,尽快打开本商品销路,以利于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内陆的广阔市场^[9]。荒尾精心领神会,亦称:“同感于打开清地商业之夙愿,抱定信念潜入支那中部贸易,以提振我商业,依据托卖规则,尽力打开此次销路。”^[9]随后,汉口乐善堂制定委托贸易规则,竭力为日本政

府在汉口地区提供商业支持,便于日本商品在长江流域倾销。乐善堂在汉口地区主要销售日本棉织品,包括斜纹布、麻绢等,还有漆器、铜器、陶器以及海产、杂货、玻璃、香水等。日本政商界通过汉口乐善堂进行贸易周转,获利丰厚。

为了进一步扩大情报搜集范围,荒尾精迫不及待地在北京、重庆以及湖南等地建立乐善堂支部。1887年,乐善堂在长沙设立湖南支部。荒尾精认为,湖南地区频出有为之人物,诸如清中兴实际领导者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曾国荃、彭玉麟等,风气与其他地方迥异,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有最重大的影响,且当时湖南还未曾有更多外国人涉足,欧美传教士进入这一地区也十分有限,“因此,了解此地内情十分必要”^{[2]21}。1888年,荒尾精又设立了重庆支部,并逐步将其作为汉口乐善堂的核心支部,先后把石川伍一、松田满雄等人调入该地,以加强对四川地区的情报搜集与经济渗透^{[10]37}。荒尾精之所以十分重视乐善堂重庆支部的建设,主要源于四川优越的地理环境。他认为:“四川形势险要,东有三峡,北有秦岭山脉,形成天然屏障,实为举事的理想之地。”^[10]随后,石川伍一等人即从重庆出发,溯长江而上,西至西康、藏南地区,再沿长江而下,经四川到达云南、贵州一带,大量搜集当地的军事经济情报。后来他们将获取的情报整理成《四川报告书》,该报告书不仅详述了西南地区山川形势、要塞、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现状、水路物资的多寡、金融以及交通运输状况等,而且附有细致的图说^{[4]261},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情报。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乐善堂在四川地区窃取情报过程中,曾专门探查银耳的生产情况。银耳是日本饮食中非常名贵的料理食材^[11]。为了掌控银耳的生产、销售情况,乐善堂以四川、重庆为中心进行了详细探查,探查项目主要包括:银耳的主要产地、采收时期、市场售价和采集数量以及银耳与普通木耳的差异等^[12]。四川地区银耳的主要产地为龙安、绥定与保宁三府,“银耳以此三地产量最多”^[13]。通常情况下,银耳生发的树干以普通木耳生发树干为基础,在四川地区,银耳以青桐木为生发树干,采收时期多为春秋时节^[13]。银耳种植与普通木耳的种植方法相同,均以采伐四五尺长青桐木放置深山之中,木耳生发前,通常以熟米汁浇灌,三五年后,木耳自然生发,最后一季,生发则是产量极少的银耳^[13]。银耳在四川地区的价格依据品质好坏而不同,从斤银四

五两至十四五两不等;市场银耳销售量大约一千斤至两千斤左右^[13]。乐善堂对银耳生产、销售情况的探查可谓细密之极。仅以此为例,便可想见,乐善堂在中国长江上游地区针对当地诸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以及风俗等方面的情报搜集,该是何等细密与全面。

三年后即1889年,荒尾精回国复命。他将乐善堂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及其个人对中国的见解详加整理,形成数万字的《复命书》,向日本参谋本部报告。在论述晚清中国实情时,荒尾精指出:“窃观清国内治之现状,已承二百余年之积弊,上下已达腐败之极,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建国之基础亦几近倾颓。……犹如积年之痼疾,已陷全身麻痹,肢体无法活动,仅以姑息疗法,只可防其浓溃而已。若不立即施行断然之处法,日后即便扁鹊再世恐亦无可救药。”^{[14]476}针对如此积弊,荒尾精提出尽早侵略中国的“对策”,他认为:“就清国地势而言,与我国不仅呈唇齿相依、辅车相保之势,且土地广大,富源丰饶,据亚细亚之中原,保有此,则足以在亚细亚称霸。若振兴清国,则足以制衡欧洲。故将来我国欲与欧洲对峙,若进而与其争衡,则非与清国形势结合不可;若退而防止欧洲之侵取以保国,亦非利用清国之地势不可。若清国一旦为外国所制,则我国形势亦岌岌可危,进而不得,退而不能,即我国亦将消亡也。故清国之忧,即我国之忧,此非手足之疾,实乃心腹之疾也。”^{[14]490-491}因此,日本必须先发制人。

在处心积虑经营以汉口乐善堂为核心间谍机构的同时,荒尾精不忘乐善堂开办之初的“宏愿”:办一所“为治理东亚做准备而培养必要人才”的學校。1890年,日本政府在内阁机密费项下拨付4万元,资助荒尾精在上海创办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新闻谍。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这两个间谍机构为日本立下了巨大功勋。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后,汉口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先后派出19名职员和72名毕业生参加日本军队在华的间谍活动,大部分担任翻译,17人参加战争谍报活动,其中有10人被中国政府逮捕,按国际法处死^[15]。日清贸易研究所除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供大量军政情报外,也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所根据汉口乐善堂调查报告编辑出版的《清国通商综览》,共二编三册,煌煌2300余页,成为研究清末中国问题极具价值的文献^[16]。

四、结语

荒尾精及汉口乐善堂在长江流域的间谍活动

是明治时期日本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侧面。荒尾精所处的时代,恰是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社会思潮剧烈动荡,面对未来发展道路,诸多思想家提出了既彼此乖离而又相互交错叠合的社会改革方案。不论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海外扩张论”,还是福泽渝吉的“脱亚论”,都对荒尾精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荒尾精意识到中日两国是“唇齿相依、辅车相保”关系,因此,寄希望于“以厚植友谊、同心一致来振兴东洋大势”^{[14]492}。但实际上,荒尾精在希望中日两国共同强大、抵御西方侵略的思想中,又囿于日本传统的“皇权”思想,奉行日本皇室乃“万世一系”等观念,试图以此来凝聚日本民众思想,实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质而言之,荒尾精的“兴亚主义”是典型的侵略思想,其最终目的乃是要以日本为中心,建立所谓的“东亚同盟”,展拓日本在亚洲的势力范围。这种思想在当时日本有一定的影响力,故荒尾精创办汉口乐善堂时,许多日本浪人或所谓“志士”投奔而来,成为忠实追随于其左右的间谍分子。特别在二战前有关荒尾精的著述中,他被推崇为“巨人”“我东方志士的北山泰斗”^{[5]321}等,也进一步说明荒尾精的侵略扩张思想及其言行在当时日本具有一定煽动力和蛊惑性。

荒尾精在湖北汉口创立的乐善堂是明治时期日本在中国设立较早的对华情报据点。汉口乐善堂在长江流域的情报活动与经济渗透是日本早期侵略中国的具体表现。在创立汉口乐善堂之初,荒尾精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乐善堂建立的目的是“为世界人类的利益,第一要务为改造支那”^{[4]346}。究其实质,乃是企图利用中国作为日本的市场与“屏藩”,达到既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动力与保障、又为日本免遭西方列强侵略提供庇护之目的。乐善堂建立后,包括日本军政商界都对其给予支持和帮助。乐善堂对中国的情报活动和经济渗透刺激了日本进一步侵略长江流域的野心,更为重要的是使长江流域成为列强争相攫取利益的地区。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强加给中国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开放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即为最典型的例证。荒尾精通过《复命书》向日本国内宣传其“兴亚主义”和“宇内统一论”思想,利用贸易方式来拓展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和势力,并以此来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17]。1896年,荒尾精在台湾因感染鼠疫病死,但其“兴亚主义”和“宇内统一论”思想在日本仍具有相当影响力,尤其是以根津一、宗方小太

郎等人为代表继承荒尾精的衣钵,继续从事对中国的情报搜集与经济渗透活动。

参 考 文 献

- [1] 商鸣臣.甲午战争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26.
- [2]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M].东京:东亜同文会,1936.
- [3] 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
- [4] 周德喜.荒尾精的在华情报活动[J].日本研究论集,2005(9).
- [5] 黑竜会.东亜先覚志士记伝:上卷[M].东京:原书房,1933.
- [6] 王振坤,张颖.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1卷[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49.
- [7] 沪友会.东亜同文书院大学史[M].东京:东亜同文书院,1982:34.
- [8] 漢口在勤町田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清国漢口居留地外二本邦人開店一件[M]//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23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890.
- [9] 本邦産紋棉南部試売品在清国漢口樂善堂へ送付方同堂ヨリ出愿一件.明治二十一年[B].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蔵館における請求記号:B-3-5-4-13_001-0061).
- [10] 戚其章.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J].晋阳学刊,1987(4).
- [11] 清国产白木茸二関シ取调方天野国一ヨリ出愿一件[B].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蔵館における請求記号:B-3-5-2-119-0356).
- [12] 清国产白木茸二関シ取调方天野国一ヨリ出愿一件[B].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蔵館における請求記号:B-3-5-2-119-0357).
- [13] 清国产白木茸二関シ取调方天野国一ヨリ出愿一件[B].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蔵館における請求記号:B-3-5-2-119-0369).
- [14] 荒尾精.复命书[M]//东亜同文会.对支回顾録:下.东京:东亜同文会对支功勞者记伝编纂会,1936.
- [15] 佚名.甲午战争时期活动嚣张的日本间谍[EB/OL].(2013-08-22)[2013-09-06].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8/22/c_132653195.htm
- [16] 黄福庆.甲午战前日本在华的谍报机构——论汉口乐善堂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J].近代史研究集刊,1984(13):323.
- [17] 徐静波.明治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以亚洲主义者荒尾精为中心[J].复旦学报,2012(1):131.

[责任编辑 李丹葵]